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闻一多



## 引 子

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  
有力如猛虎。

你是一团火，  
照见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朱自清

诗中的“你”，就是本书中将要介绍给读者的主人公——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诞生于湖北浠水的乡下。1946年7月15日，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所暗杀，壮烈地牺牲于昆明。

在这不足四十八年的时间里，闻一多经历了祖国的苦难与忧患，走过了那曲折的、充满了矛盾的、而终于找到了真理的道路。他在诗的海洋、学术领域中孜孜探索，他为中华民族的民主事业搏击奋斗，他的一生就是动人心弦的壮丽诗篇。

闻一多，是诗人，是学者，是民主斗士，是一团火。

### 一、童年生活

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未时，在湖北浠水县的巴河古镇附近的望开湖湖边，一幢瓦屋里呱呱坠地了一个婴儿，他，就是闻一多。

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字益善，号友山、友三。《论语》中的《季氏篇》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可见，他的名与字号也是出自治世经典。闻家的这个新生儿备受父母的怜爱，并期待他能光宗耀祖。当父母送他入学读书时，就径直用了“闻多”两字。“一多”之名则是闻一多自己在后来改的。

闻一多出生在清末秀才之家，在这个世家望族的环境之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他自5岁开始便入私塾，学习《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和《四书》，在极其严格的家教督促下，接受了启蒙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弃、新式学堂的建立，一多的祖父佐浚公仿照流行的学堂，办起了家塾，并起名“绵葛轩小学”。于是，一多又与自家的子弟在这儿读书，除了例课之外，还学习了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课程。

闻一多自小就酷爱读书，每当门外来了花轿或龙灯的时候，别的孩子都会跑出去看热闹，只有一多依然坐在那里，安心看书，不受干扰，为此常常会得到祖父的夸奖。一多不仅在白天念书，晚上还随父亲（闻廷政）读《汉书》。一次，一多“数旁引日课中古事之相类者以为比，父大悦，自尔每夜

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这些教育对一多的一生都有价值，他后来的成就，不能不说也受益于此。一多还是个兴趣广泛的孩子，他对绘画的兴趣尤为突出。他从父辈那里受到感染，学着作画。这种发于自然的涂鸦，竟对一多的一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0年，11岁的闻一多离开闭塞的乡村，来到武昌求学读书。秋天，一多被颇有名气的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录取了。在这里无论是教材、方法，还是执教的教师，都与旧式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家乡的家塾更是与之无法相比。一多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知。

闻一多在这里只读了一年，中国就发生了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它使一多中断了学业，但也使他目睹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

当街上枪炮林立的时候，一多不但没有惊慌，反而异常兴奋，竟然把头后的辫子剪掉了。这可是个不小的举动啊！此刻剪掉辫子，意味着与清王朝的决裂，然而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清政府的军队时刻都会反扑。但此时的闻一多不过12岁，想的自然没有那么多。不久，反动军队很快反扑了，武昌城中气氛紧张，形势危急。于是，学校关闭，一多随着避难的人群涌出城，返回了老家。

当这个伢子回到乡里的时候，大人们都用惊异的目光望着眼前剪了辫子的他。一多就像是凯旋归来的小战士，将有幸目睹的一切讲给人们听。后来，他还将看到的情形画成类似连环画的图画贴在墙上。不用说，这一历史事件已在年仅12岁的一多脑海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记。

## 二、入京求学

1912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2月12日，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诏退位。沿续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了。当国人欢庆这一胜利之时，革命党人则将斗争取得的权利拱手相让给了貌似赞成共和的新独裁者。3月10日，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了。

这年春天，革命后的武昌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闻一多又回到省城，在民国公校继续读书。父亲闻廷政希望一多走哥哥们的路，成为实业人才。所以他又转入一所实修学校学习。

到了夏天，省教育司门前贴出了清华学校的招生启事：招收4名15岁以下的高小学生入中等科一年级，入学后学费膳费全免，8年后公费资送美国留学。闻廷政看到这一招生启事后很是动心，4个儿子都要上学，其经费是很难筹到的，何况分家时只得了五、六百担租子，经济上并不宽裕。清华学校学费、膳费全免，的确是送子入学的好地方。此外，当时的多数家长对蛮夷之国存有戒心，谈起出洋更是不免有所畏惧，以至不愿送子弟入洋学堂读书。而那些官僚买办大家子弟有的是出洋机会，无需到清华园里苦熬8年才迈出国门。所以当时报考清华的人远不如以后那么踊跃。闻廷政毅然决定送闻一多前去报考。

初试就在武昌举行，闻一多的历史、地理、算学、英文成绩平平，而他的作文《多闻阙疑》却得到了考官的惊异和赞许：一个少年之手，竟能摹仿梁启超的文笔——当时最为时髦的笔法。这篇出类拔萃的作文使一多独占鳌头，获得备取第一名，有了入京复试的资格。入京复试时，他以鄂籍第二名

的成绩被正式录取。

1913年，刚满13岁的闻一多走进了用“庚子赔款”组建起来的“清华留美学校”。这个学校的学制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其中中等科有五个年级，高等科有三个年级（以后又改为各四个年级了）。中等科新生入学后英文统授一年级课程，只有中文依各新生程度分别列入各级。当年入学的42个新生大多分在一至三年级，只有闻一多因中文成绩突出被列入五年级。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一切课程设置都服从于留学，所以英文是门主课，许多课程又都要用英语讲授。为打好英文基础，闻一多不得不留了一级，重新从中等科一年级读起。此后，他在这座亭园优美的清华园里，整整度过了十年。

清华学校的考入，使得闻一多从闭塞的乡村走进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里，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学到了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同时，又由于这里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之地，特殊的环境促使他的思想早熟起来。它对闻一多的成长，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 三、活跃在清华园

闻一多是从中等科一年级读起的，到高等科毕业为辛酉年（1921年），人们使用习惯的甲子系年称他们为“辛酉级”。

在辛酉级中，闻一多是个勤奋用功、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一直名列前茅；就是寒、暑假期间读书写作也不间断。不仅如此，他的涉猎范围也很广泛，从古诗辞到西洋的诗歌、散文，从历代兴亡的更迭到达尔文的“天演论”，都是“兴味盎然”、“博学众采”。闻一多还是当年清华园内颇为知名的“文人”，从1916年起，就是《清华周刊》和《清华学报》的积极撰稿人，以后又先后担任这两个刊物的总编辑和编委。由于他的国学根底较好，学校的刊物上会经常见到他所写的旧体诗和骈体诗，并以文会友。

清华园不是世外桃源，围墙里的学生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变迁。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加紧，人们的忧国忧民情绪也是与日俱增。闻一多也随着一天天的长大，忧患意识在其身上也逐渐明显起来。在围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中心的辩论会上，闻一多常常担任主辩，反映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

1919年，北京学生界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影响巨大，闻一多也汇入了这场洪流之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锻炼。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遭到无理拒绝。消息传来，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学生们怒火冲天，放火烧了主张在和约上签字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宅第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了许多学生。

清华学校因在郊外，未能与城中取得联系。4日晚上，闻一多从进城返校的同学那里得知了白天的情况后，挥笔抄写了岳飞《满江红》，并在深夜贴在了饭厅的大门上，以那深印在中国人民心中气壮山河的爱国诗篇激励自己的同学，既体现了对北洋政府卖国屈辱罪行的愤怒之情，也抒发了他们驱逐外寇、收复河山的豪情壮志。

清华园沸腾了，为维护国家主权、营救被捕学生，积极讨论开展爱国运

动的办法。闻一多被选为学生代表团的成员，他以全部精力担任着宣传工作，学校在这次运动中的许多重要文献就是他参与起草的。罢课期间，闻一多又通过翻译《台湾一月记》，以敲起以史喻今的警世钟。到了“六·三”以后，闻一多还亲自参加入城演说，完全投身于爱国运动之中。他曾对父母这样说过：“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以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这些话，深深地反映了闻一多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人格和情操。

“五四”运动以后，祖国的忧患和新思潮的影响，使闻一多对现实有了越来越多的想往，他开始探索，试图用新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1920年秋，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第一首新诗《西岸》，接着又发表诗评和其他作品，更加注重诗的社会价值和思想价值。对动笔写诗，闻一多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发酵底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己爆发了，流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诗人总要抱着这句话做金科玉律。‘可以不作就不作’。”闻一多以他的探索和才气，涉入中国的诗坛，并成为“五四”后新文艺园地里的拓荒者之一。

在学生时代，闻一多也爱上了戏剧，是清华话剧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同时也爱好绘画，当结束清华学习选择留美专业时，还把艺术当成自己努力的事业。闻一多不仅生活内容丰富，也生活得很正直。在一味追求美国化的学校里，他为反对歧视“国文”课而大声疾呼；为反对宣传强盗文明的美国电影在清华上演而掀起论战。他对学校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总是勇于公正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决不趋言附合。

1921年，辛酉级进入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一面准备大考，一面慎重选择留洋后所学的专业。闻一多成为清华学校毕业生中第一个攻读美术的学生。

但是，就在毕业考试的前夕，北京城里传来“六·三”惨案的消息。事情是这样的：北洋政府因筹集军费参加军阀混战，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北京国立8校教职员为了索薪，宣布停止职务。但北洋政府置之不理，6月3日，马叙伦、李大钊等组织了罢教斗争，22所学校600多学生聚集于新华门前请愿，结果遭到军警的殴打，受伤者达20余人。“六·三”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学生立即罢课，抗议军阀的暴行。清华学生也决定支持这一正义斗争，实行罢课。

为此事，辛酉级召开了两次会。他们面临着毕业留洋的严峻形势，若拒绝参加毕业大考，8年的寒窗苦读就会付之东流，这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无疑是人生关口的重大选择。闻一多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坚决声援索薪斗争，坚持参加罢课。

对此，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企图以开除来迫使学生终止罢课。6月18日，没有学生走入考场，正直的学生没有向这种镇压正义斗争的反动手段屈服。于是，学校当局临时改变策略，宣称22日大考，只要悔过，出国的照样出国，升级的照样升级，否则就以留级处分。他们改换手法，以分化学生的团结。这时，辛酉级有人顶不住压力，怕失去最后机会，22日，辛酉级

有三分之二的人走入考场，而全校除他们外，都拒绝考试，闻一多与同级的共 29 位毕业生在巨大压力面前没有屈服。

学校的处分降临了，闻一多与多年的同窗挥泪而别。但是，闻一多十分坦然，他在这个考验的关头，宁可失掉出洋的机会，宁可留级，也为维护正义绝不低头。就这样，本应毕业的闻一多，被无理地推迟了一年，仍然留在清华。

对闻一多等 29 人的处分一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学生们都离开了北京，可报纸上仍不断地刊登各界的抗议与质问。这年 8 月，学校给回到滹水的闻一多寄出通知：只要肯签具悔过书，即可次年出洋。暑期过后，闻一多等 29 人回到清华园，但没有一人去写悔过书。最后仍旧做因罢课自愿受罚而多留一年之学生。

1922 年的寒假，闻一多回到家乡，为尽孝子之心而成婚。3 月，又返回京城继续学习。6 月，闻一多结束了在清华的求学生活。

#### 四、留学美国

1922 年 7 月 16 日，闻一多乘着 Key Stone State 号海轮，离开上海，离开祖国，缓缓地驶向太平洋的彼岸——美国。

在旅途中，当许多青年学生都在为出国镀金而兴高彩烈的时候，闻一多却被悲哀和惶惑所缠绕着，而那种单调、枯燥而寂寞的旅行，更增添了这位游子去国外的愁思。《孤雁》就是他在旅途中这种心境的真实记录。在诗中，闻一多把自己比作“不幸的失群的孤客”，“流落到这水国底绝塞，拚着寸磔的愁肠，泣诉那无边的酸楚”，而将要抵达的则是“苍鹰底领土”，“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底鲜血，吐出些罪恶底黑烟，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教你飞来不知方向，息去又没地藏身呵！”这是闻一多怀着“孤寂的流落者”的心情而写下的一首诗，后来被编入《红烛》诗集，排在海外作品之首。

经过近半个月的航行，8 月 1 日，闻一多在西雅图登上美国的土地。7 日，终于结束了旅行，来到密歇根湖南端著名的都市——芝加哥。

闻一多到美国后，并没有醉心于西方的生活方式，更没有倾倒在铜臭的文明面前，当他置身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之中时，更多的是激起了他那爱国之情，他告诉身边的同学要时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为国家、为民族造点光明。

离国只一个月，闻一多就无限思念祖国，为此，他写下了一首《太阳吟》，表现了一个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诗中这样写道：

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  
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  
又加他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  
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  
烘干了小草尖头底露水，  
可也烘得干游子底冷泪盈眶？  
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  
省得我受这一天天底缓刑，  
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又与你何妨？

太阳啊，——神速的金鸟——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这诗句多么热烈，多么深沉，作者恨不得骑上每天绕行地球的太阳，以便能天天望见家乡。这里的“家”，是“祖国”的代名词，正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上所写道的那样：“不要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闻一多还写下了许多爱国思乡动人的诗篇，就像他所说的：

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1922年9月25日，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学了，从此，闻一多开始接受传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他学习认真、刻苦，屡蒙教员夸奖。经过一年级的学习，他获得美国教育界给学生的最高褒奖——最优等名誉奖。

在攻读美术的同时，闻一多还念念不忘文学。当时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如德莱塞、安德森、桑德堡、马斯特斯等，都活跃在这座城市。于是，与芝加哥诗坛的来往，也是闻一多的最大愉快了。很快，他的诗还上了外国的诗坛。在与诗人结交的过程中，丰富了闻一多的视野，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感情，他笔下的诗，已是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和发扬。

1923年9月，闻一多还在异国他乡继续学习的时候，他的诗集《红烛》在知己梁实秋的鼎力相助下，终于问世了。诗集分作《序诗》、《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其中最让人瞩目的，是国外创作的思乡部分。一首《忆菊》，写出了诗人的心声：

啊！自然美底总收成啊！

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啊！

啊！东方底花，骚人逸士底花啊！

那东方底诗魂陶元亮

不是你的灵魂底化身罢？

那祖国底登高饮酒的重九

不又是你诞生底吉辰吗？

你不像这里的热欲的蔷薇，

那微贱的紫萝兰更比不上你。

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

啊！四千年华胄底名花啊！

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

啊！诗人底花呀！我想起你，

我的心也开顷刻之花，

灿烂的如同你的一样；

我想起你同我的家乡

我们的庄严灿烂的祖国，

我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

习习的秋风啊！吹着，吹着！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请将我的字吹成一簇鲜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然后又统统吹散，吹得落英缤纷，  
弥漫了高天，铺遍了大地！  
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这首诗从菊花的摆设、姿态写到环境、颜色，借菊花细致入微地寄托了作者对祖国的赞美。

《红烛》是闻一多成长过程的一部诗史。

闻一多在美国的留学，芝加哥是第一站，以后又在科罗拉多、纽约大学等地学习。

按照规定，闻一多应该在美国学习五年。但是，他不喜欢美国，特别是对美国的民族压迫，更是不能容忍。不仅黑人受着非人的待遇，就连中国也经常受到难堪的侮辱。如清华的陈长桐去理发，理发师公然称不伺候中国人。闻一多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时，竟没有一个美国女生愿与他们同台领取毕业证书。这些直截了当的侮辱，都深深刺痛了闻一多的心，更使他的民族自尊心难以容忍。在一封家书里闻一多愤慨地说道：

“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

闻一多终于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只在美国生活了三年就决定提前结束留学生活。

## 五、诗人情怀

1925年5月4日，闻一多与余上沅、赵太侔踏上了归国之途，他们乘火车离开纽约向西岸奔去，又经过半个月的海上航行，终于在6月1日踏上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土地。

当轮船驶进吴淞口的时候，闻一多就立刻脱去三年来束缚着他的洋装。从此，就一直穿着长袍布履，有时还穿上马褂，冬天则把棉裤捆起，穿上一双朝靴，令人难以认出这是位留洋回来、又以浪漫情调知名的诗人。

闻一多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来了，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就在两天前，这里发生了“五卅”惨案。如似一盆冰水浇到了闻一多的头上，我的祖国依旧遭受着帝国主义的蹂躏，我该做些什么？

正在上海从事戏剧、电影工作的洪深、欧阳予倩都劝说闻一多留下来共事。但北京——中国的文化中心，对他的吸引力更大。

来到北京，闻一多先后在杨振声主办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等诗，在这些诗中，他控诉帝国主义如虎豹豺狼糟蹋神州的可耻行径，呼唤“熟睡的神狮”快快醒来；他哭诉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的百般痛苦，要求失地回到母亲的怀抱；他歌颂祖国的灿烂文化，抒发爱国之情。闻一多以诗笔为武器，与全国民众掀起的反帝高潮融为一体，引起了民众的共鸣。



特别是那首《我是中国人》，一直被人引吭不断，它以“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既作开头，又作结尾，突出了诗的主题。诗人十分自豪地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以讴歌爱国之情。紧接着，诗人的笔锋一转，发出心底的呐喊：我的心里有尧舜底心，我的心是荆柯聂政底血”，这还不够，诗人又写道：

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这诗句惊心动魄，这诗句激昂振奋，一入国门，闻一多就以他那非凡之笔初次亮相。

回国不久，闻一多担任了北京艺专的教务长，为开展国剧运动和建立艺术剧院积极奔走。然而那是个政局动荡的年代，有为的志士无处施展抱负，国剧运动的幻想破灭了。与此同时，闻一多还加入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是他回国后为改造社会而做的第一次政治努力。

1926年，执政府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三·一八惨案”，闻一多没有拘泥于派别的不同而沉默，他在悲愤中握笔写下了《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一诗，给烈士以崇高的礼赞，给生者以深深的激励。继《唁词》之后，闻一多又借人力车夫的口吻，抨击北洋政府，写下了《天安门》一诗。这时的闻一多，更强调文艺与爱国运动的密切关系，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中写道：“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上，流在纸上。”此后，闻一多跃上文艺的战马，用文艺来表达、抒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对新诗不能忘情的闻一多，创办了《晨报·诗镌》。1926年初，他迁居京西畿道34号，为布置这个家，他别出心裁，别具一格地安排了一个激发想象、特具引力的“黑屋”。这间不寻常的“黑屋”，成了一群豪迈、洒脱青年诗人的乐窝。在这里，他们朗诵诗作，悟出门道，形成新的诗风——“格律派”。闻一多就是这群诗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人。

就在闻一多潜心构筑新诗大厦的时候，北京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政变发生，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局势混乱不堪。闻一多携眷返回故里。不久，为了谋求职业，他只身到了上海，在朋友的帮助下，受聘于上海国立政治大学。

从1926年到1927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残暴，国民革命内部又出现分化。在这急剧的动荡变化之中，闻一多困惑、迷惘，心情极为压抑，这使得他又一次用诗来表达其心境。他发表了与饶孟侃合译的美国诗人曼斯菲尔德的《我要回海上去》，还写了《心跳》、《荒村》等诗，把对旧世界的痛恨和对军阀混战的憎恶之情表现的十分鲜明。

《发现》一诗，可谓是闻一多血和泪的哭泣，他面对军阀混战、人民痛苦，喊出“这不是我的中华”的呼声，诗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他怒火的奔泄：

我追问青天，逼迫人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这一时期，闻一多发表的诗还有《贡献》、《罪过》、《收回》、《什

么梦》（修正稿）、《你莫怨我》、《你指着太阳起誓》等。

闻一多曾说过：“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段话，道出了诗人最真切的感觉。如果说闻一多的诗可以分出几个阶段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诗就组成了闻一多爱国诗的新阶段。朱自清曾颇为感叹地说：在抗战以前的诗坛上，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

## 六、学者风范

从1927年到1937年，闻一多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书。开始，他讲授外国文学、英诗和戏剧，后来却完全转向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就在他的生命史上，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诗人转变成学者。

这一转变，使闻一多在古籍里几乎钻了将近二十个年头。他埋头苦干，废寝忘食，以全副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

在青岛大学，他给外文系开设“英诗入门”，搏得学生的称赞。当讲雪莱的《云雀》时，他随云雀越飞越高，朗读声音也越来越强；介绍浪漫诗人时，他随诗句的起伏、变化而与听者进行情感的交流，创设意境而体味诗人的情怀。……闻一多那诗人的气质，令许多听课的学生陶醉。

1932年8月，闻一多回到离别已整整十年的清华园，被应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十年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对闻一多来说还是那么的熟悉和眷恋；这里的教室、体育馆、宿舍楼、校园小径，都可以勾起闻一多对往事的回忆。如今他又重新回到这安静的校园，又可以潜心治学，真是不亦乐乎。从此，闻一多再也没有离开这所学校。

这段时间，闻一多排除一切琐事，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与研究之中。闻一多以诗人成名反来要教古典文学，加上又非中文文科毕业，心理上总感到没有根基，若再不拚命，就难以胜任。于是，他憋足劲头，非要做出成绩不可。

他先后研究了《唐诗》、《楚辞》、《周易》，整理和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资料与论著，为中华文化事业的繁荣增添了不朽的一页。此外，他还对《庄子》、《尔雅》、《乐府》也倾注过相当的努力，并且涉猎神话研究，还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闻一多的研究成果富有特色，那是因为他不但继承了前人的宝贵传统，而且吸取了现代的观点与方法，使他能在学术的海洋中自由地游泳。他重视研究材料，尽可能地收集与之相关的资料，为写《杜甫》传记，他收集了与杜甫交往过的360余人的资料，可以想见，他治学的顽强和严谨精神，也正因此，就连文物、绘画、石刻、口传资料也在闻一多的笔下变活了，无一不运用自如。在作学术研究中，闻一多不因循保守，敢于自辟新路。《周易》虽是一部古老的书籍，前人已有相当的研究，闻一多没有沿老路走，而是用社会学的眼光进行研究，通过摘注一般人所忽略的材料，给《周易》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立意。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是闻一多研究学术的又一独特之处，并使他提出许多真知灼见。闻一多在学术活动中，始终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个别领域里，他从诗跨到史，从文学跨到哲学，将研究的课题伸展到许多领域。与此同时，他试着用新思想、新原理去解决过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过去考证、诠释甲骨文字和金石铭文，往往只在文字上兜

圈子，为考证而考证。现在则能从这些文字和实物上看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情况，进而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这种新思想的光芒照射下，一片片古董都变得富有生命意义了。

闻一多从发展的眼光出发，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辛勤钻研和摸索，留下了光辉的成绩，成为知名的学者。与此同时，在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中也蕴育出了新的思想转变，闻一多将走上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 七、迅猛的转变

1937年7月7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了雄壮的帷幕。

到了8月，清华奉命南下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于10月到达湘江边上的古城长沙。以后又赶往南岳，因为临大文学院设在南岳。

1938年，在南京失守、武汉吃紧的时候，长沙临时大学又起议迁滇。湘黔滇全程长达3300余里，这样长距离的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壮举。

闻一多勇敢地参加了步行团，随着许多青年一道沿着红军在湘、黔、滇所曾经走过的道路，从洞庭湖边一直步行到昆明。历时68天，行程三千多里。

这艰苦的68天，在抗战教育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闻一多的一生中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沿途中，他体会到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的抗战热情，也亲眼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和祖国的苦难，从而更加深了他对旧中国的认识。多年来，他在象牙塔内、故纸堆中埋头于学问，与中国社会的下层生活有所隔膜。现在，他开始了解他们、贴近他们，并意识到不能让祖国听任“丑恶来开垦”了。

自此以后，闻一多积极投身于抗战的活动之中。他为话剧《祖国》设计布景，为《原野》设计服装、道具。在三转弯岑公祠内，他撩起长袍生炉子熬胶水，亲自绘制布景，由于布景较大，有的一幅就要画上一、二天。大家想不到，堂堂的文学教授，还有如此才干，还能吃这般辛苦。此外，他还一直关心和帮助奔赴抗战前线的青年。这些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闻一多积极投身参加抗战的态度。

在反动派的无情压榨下，靠薪金度日的知识分子，生活也已跌落到社会的最下层。闻一多的生活也沦为赤贫了。他一个月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因此常常提前支薪，再不行，就开始借债了。饭碗里半月不见一个肉星，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读书人最爱书，然而为了过日子，闻一多只好忍痛把好不容易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为了省炭钱，他每天清晨带孩子去河边洗脸，为了节约车费，他每星期提着书包在城乡来回奔走几十里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没有怨言，他总和前线抗战的将士相比，说人家在拚命，我们只不过生活苦些罢了。当孩子们有时饿得难过时，他就说，这是抗战，吃点苦应该的，等胜利了就好啦！

闻一多的许多早年朋友，都在重庆反动政府里当了大官，他们给闻一多写信，劝他不要教书，到重庆做官。闻一多总是严辞地加以拒绝。还有的人为做政客幕僚而将教学任务弃之不理，对此闻一多毫不客气地斥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他自己始终坚持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岗位。

本来，闻一多会画、能写、凭他的名望是很容易得到另一些文人所得的收入。但是，他不肯于这样。后来每月工资只够一家人十天的伙食费用，更难以担负孩子的学习费用，八口之家实在挨不下去了。他这才在学生的帮助下，到中学兼几堂国文课，以救济生活。不知是谁说，你懂艺术，又会刻图章，为何不利用这门手艺呢？就这样，从1944年起，他兼搞起“手工业”来了，凭着这支铁笔把他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他曾解嘲地说：“我这个国文教员变成手工业者了。”

这一切，逐渐把这位学者拉到现实中来。当闻一多亲身经历了这段下层苦难生活之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发生了极为关键的变化。这一点从他所写的文章中是不难看到的：中国要的“不是对付的，将就的，马马虎虎的，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上弥留着的活着，而是完整的，绝对的活着，热烈的活着——不是彼此都让点步的委屈求全，所谓‘中庸之道’式的，实在是一种虚伪的活，而是一种不折不扣，不是你死我活，便是我死你活的彻底的认真的活——是一种失败在今生，成功在来世的永不认输，永不屈服的精神！”闻一多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思中，逐步走上新的道路。

闻一多要求自己活得像个人，二十年前做学生的时候，他都可以做到宁可留级一年也不沾污人格向学校悔过，今天就更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更不能向腐败的统治者乞怜和示弱。对这位正直的学者，进步的同学和学校的地下党员常来看望他，安慰他，在生活和业务上又紧密地团结他。于是，他和青年们更接近了，并对一切新鲜的事物滋长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的感情。

1943年8月的一天，朱自清先生把同学们找到的一本田间的诗集递给他。好久没有读诗的闻一多，乍一看诗集说道“这也算诗吗”，可他仔细地吟味后，觉得这诗质朴、干脆、简单、坚实，就如同一声声的鼓点，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它是鼓的声音，战争的声音。他将这种感受还带进了课堂，并带着剖析自己的语气讲到：“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田间的诗让我们“听到了鼓的声音”，“田间实在是这鼓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这时代的鼓的声音”。闻一多以其精湛独特的见解，清脆爽朗的国语，激动了听课的学生，甚至连过路的人也在窗外驻足旁听。这堂课在沉寂的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

在国统区，一位著名的教授敢于公开赞扬解放区诗人，还真是破天荒头一次。闻一多开始觉醒了，开始呐喊了，他用健康的声音和那些在校内宣传艺术至上的哲理诗人们展开了战斗，就如同他所说的：“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放了。”可见，诗人、学者开始转变了。

一旦认准了方向的闻一多，便显示出他那特有的饱满热情。他不仅赞扬解放区的诗人，而且提倡学生写新诗做新人，他自己则一口气写下数篇针对现实的杂文，向社会发出吼声，“向圈子外喊去”。不仅如此，闻一多还以自己的转变为例证，希望躲在象牙塔中的学人走出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与青年的步调同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这种在解剖别人的时候没有忘记现身说法首先解剖自己的做法，体现了闻一多敢于否定过去的博大胸怀。

已经觉醒了闻一多，已不再满足于呐喊和单干，思想上的饥渴促使他

更积极地向进步力量靠拢。共产党也非常珍视他的每一分进步，在他迫切需要依靠的时候，给他以支持和鼓舞。

华岗，化名林石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他受周恩来委托，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周恩来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大约在1944年的夏秋之交，华岗在尚钺陪同下拜望闻一多。交谈之中，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华岗邀请闻一多参加正在筹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闻一多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表示一定参加。不久，西南文化研究会诞生了。通过在研究会的座谈、学习，闻一多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对于《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文献，他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日渐提高，他从英文版的《西行漫记》中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了解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对于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顽强斗争的精神，闻一多从心底里佩服至极。他还兴奋地将毛泽东的照片让妻子、儿女看，并表示回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孩子到解放区去读书。高孝贞牢记他的这句话，1948年3月率全家奔向解放区。

闻一多在呐喊中逐步认识到，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唯有加入一个组织才有力量。经过慎重考虑，1944年秋闻一多秘密地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宣誓“为民主前途奋斗”。加入民盟后，闻一多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他的朋友和学生。他曾对前来看望的程应镠悄声说：“我从‘人间’走入‘地狱’了。接着，他又感慨地说：“以前，我在龙头村，每回走进城，上完了课，又走着回来，我的太太总是带了小孩到半路上来接我。回到家，窗子上照着的已是夕阳了，孩子围在身边，我愉快地洗完脚，便开始那简单而可口的晚餐。……那一天也总过得很快乐。”“现在，那种生活也要结束了。”

闻一多的好友罗隆基曾这样说过：“一多是善变的，变的快，也变的猛，”“不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告诉他“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是的，经过迅猛改变的闻一多，向旧的生活告别了，从此汇入民主运动的洪流，并为民主不倦地斗争。

## 八、民主斗士

闻一多的这一转变，不是简单的转变，这是经历了四十多年漫长曲折的道路才找到的归宿。他曾向往过祖国的富强，追求过自由，也幻想过“奇迹”；他也曾悲愤、忧郁、迷惘；他还试图以文学、学术研究来复兴祖国，然而一切都落空了。现在，他从党所领导的斗争中找到了他所追求过的真正的“美的所在”，找到了获得新生的大道，他带着从心底迸发出的热情和正义感，把自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地献给真理，献给民主运动。

要斗争，就得有基础，凭过去那些古董是不行的。他开始学习新的知识、新的理论。尽管贫困饥饿的阴影始终跟着他，尽管每天的工作、活动排得满满的，他都要挤出时间进行学习。许多时候，他还要在夜里读那些在白天

不能公开读的书刊，昏暗的电灯光射在发黄的土纸上，使得那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昏花的眼睛看起来更为吃力。但是，这些书刊中珍藏着最良好的滋补思想的营养、帮助他懂得政治懂得斗争，也帮助他更坚定、更有信心。他像一个刚启蒙的小学生，如醉如痴地汲取营养。他常说：“可惜的是，见到这些东西太晚了点，这一辈子已经过了一大半了！”随着思想的转变和认识的提高，他成为昆明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杰出的战士。

1944年，西南联大组织了大规模的“五·四”纪念活动。在纪念座谈会上，闻一多讲述了“五·四”运动的经历，接着，张奚若、吴晗等也作了发言，雷海宗的发言则提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学生过问国家的事常会由于幼稚而重于感情。这言论与会场的气氛不相适应，闻一多坐不住了，他再次起来，提出要“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以学者身份参加座谈会的闻一多，一变而为猛士，为学生的正义斗争而呐喊。接连几日，联大又召开了两次“五·四”纪念晚会，闻一多都作了精彩的演讲，人们看到了学者的力量，闻一多更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次活动，震动了整个春城，也建立了这里民主运动的基础。

7月，联大又与其它几所大学联合召开了“‘七·七’时事座谈会”，这是继“五·四”纪念后的又一次大学师生的盛大集会，它已走出联大校园，扩大到昆明各校了。闻一多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在长时间的讨论中，他认真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大会主席请他发言，他都以自己不懂政治婉言谢绝了。

但是，当他听到云大校长熊庆来的一番话后，再也忍不住了，闻一多愤慨地站起来了（据报界记载，闻一多一站起来就是万马奔腾，情绪澎湃已极），以比“五四”晚会更响亮的声音即席发言。

“谈到学术研究，……这哪里值得炫耀？哪里值得吓唬别人？谁不是曾经埋头做过十年二十年的研究的？谁不希望能够继续安心地做自己的研究？但是，可能吗？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够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

全场静静的，人们屏住呼吸，倾听闻一多这激昂战斗的诗：

“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自己怕说，别人说了，呵，又怕影响了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前程。真是可耻的自私！”

“云南大学当局是这样的！我们西南联大当局还不是这样的！胆小、怕事、还要逢迎……这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

闻一多正式同自己的同辈分手了，向那些自私的知识分子宣战了。他用心底的热情感染着学生，他与人民更加贴近了。人们也在大火的照耀下，看到了闻一多的崛起，称赞他的勇猛与无畏。

这年10月10日，昆明又举行了双十节纪念大会。闻一多第一次走出校门来到人民面前进行演讲。面对五千余人，他发出洪亮的声音：“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的家乡？”闻一多将自己的满腔怒火，传递给听众，声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演讲中，闻一多强调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要记住昆明在国际间‘民主堡垒’的美誉，我们从今更要努力发扬民主自由的精神，……我们今天争民主，……争取更普遍的、完整的和永久的民主政治。”就在大会进行之中，特务们还不放过机会进行捣乱。

闻一多面容严肃，长髯飘拂，像尊威武不屈的雕像。

在 1944 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云南人民又迎来了护国起义纪念日。29 年前，云南人民揭起义帜，吹响了埋葬袁世凯帝制的号角。29 年后，云南各界人士举行纪念大会，要求真正的民主。这一次，闻一多是面对云南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演讲。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是应该惭愧的，应该对护国的先烈们惭愧了，应该对在座的护国英雄们惭愧！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像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三十年后，我们所要的依然是民主，要打倒独裁！”

闻一多一语破的，喊出了最要害的声音。会后，激动的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闻一多走在队伍之中，亲自参加到这时代的洪流之中。

闻一多不仅在各种会议上伸张正义，鼓励民众；而且经常是重要宣言文件的起草者，为了认真地推敲行文，经常彻夜难眠，同志们安慰他的过度辛劳，他则总是笑着说：“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是啊！他只有一支笔、一张口，但他就是用口诛笔伐，为民主而不倦的斗争。

走上新的生活后，闻一多常常说民主要首先从自己做起。1945 年初，西南联大在西仓坡盖了教员宿舍，闻一多抽中了签分配到了一所住房。当时住昆华中学宿舍或搬到西仓坡是各有利弊，于是全家开民主会，以表决方式做决定。这次搬家，可说是家庭民主的体现。在教育孩子方面，闻一多也注重从己做起。一次，立鹤的一篇作文没有写好，闻一多狠狠地训了立鹤。为这，立鹤三天不出屋，不肯吃饭，一家人都不快活。闻一多也意识到这是粗暴的家长作风，于是他向孩子认错，检查了自己在教育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作风。闻一多作为一家之主，做到了有错就改，不摆架子。

昆明的民主斗争呼声愈来愈响亮，进步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似地纷纷出现，闻一多同每个刊物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指导编辑工作。在火热的斗争中，闻一多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力量。他写火热的文章，对丑恶的现实展开无情的抨击；他学习理论，积累心得，使每次讲演总是那么生动朴实，又切中时弊要害；当要刻印文件但经济不足的时候，他又自告奋勇刻写钢板，工整的小楷从头至尾一丝不苟。

在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不懈努力的过程之中，闻一多不断擂起时代的战鼓。他高度赞扬文艺的民主方向，提出要“让文艺回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反映出对进行革命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深刻认识。在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上，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道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历史是会重演的，但又不完全重演，恰是螺旋式的进展。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时代，是闻一多能够不断认清方向的思想武器。这位走出书斋不久的学者，思想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 1945 年“五四”又来临的时候，闻一多不顾瘦弱的身体，和青年们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出征前，他登台呼吁：“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间去！”这次游行，要求民主，要求和平。当队伍经过四个小时的游行后又回到云大操场时，闻一多再次出现在高台上，他高喊：“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这是时代的呼声，这是人民的呼声，闻一多就是这“时代的鼓手”。

## 九、迎接新的挑战

1945年8月10日的深夜，广播中传出日本天皇的乞降照会。昆明全城顿时响起了爆竹之声，人们涌上街头，奔走相告，战争即将结束，曙光就要到来。

此时的闻一多，正在乡间的研究所里处理工作。第二天中午，闻立鹤兴冲冲跑来报信，闻一多听后，高兴地跳了起来。那热情的样子，就像是那个欣鼓舞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同仁也抑制不住兴奋，他们尽情狂饮，让8年的苦难尽于一醉。

闻一多二话没说，就直奔附近的龙泉镇理发馆，将留了8年的长须剃去——这本是他的抗战不胜利不剃须的誓言。

他赶回昆明，满院的孩子们都向他伸出大拇指叫了起来：“顶好！顶好！”他摸着光秃了的唇腮，也不禁哈哈大笑。

然而，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国共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内战随时都会爆发。李公朴见到闻一多时就说道：“你的胡子是不是剃得早了些！”闻一多答道：“那就把它再留起来！”这些话反映了李公朴、闻一多对时局变化的忧心。

闻一多的胡子再没有重新蓄起来，但他本人又一次迎接了新的斗争。

内战的危机，使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充满了愤怒之情。在党的号召下，各界人士都发起了广泛的签名运动，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在联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被邀在最后讲话，他手里握着扩音器，发出了使好战分子颤栗的声音：“谁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当时，有些特务攻击闻一多，谩骂他是“疯子”。闻一多听后不屑一顾，并且坚定地说道：“他们是顽石，我是兰草，永远压不死，总有一天兰草长起来，将石块顶碎。”

内战的乌云弥漫着中国的天空，特务的活动也更加猖狂。面对这一切，闻一多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接受挑战，在昆明所组织的一系列民主活动中，他一刻也没有休息，战士的性格、战士的风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4日，昆明教育界在联大举办“从胜利到和平晚会”，结果混入会场的特务乘机怪叫、起哄、捣乱。担任主席的闻一多顿时发怒，他站在台上大声道：“是对的站出来，谁不主张这个会的站出来，谁不主张和平民主的站出来！”“偷偷摸摸地不算得中国人，不配做中国人。是对的站出来！”这正义之声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同时也使那些特务不敢再扰乱会议。

此时的闻一多，不仅冲上台前宣传和平，反对内战，而且以自己的学识、斗争经验帮助学生进行斗争，他为反内战讲演会出谋划策，为抗议摧残自由支援学生罢课。而当国民党的魔爪伸向民主人士的时候，他又积极地组织营救。

1946年，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闻一多被选为民盟的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同时兼任昆明“民主周刊”社的社长。

闻一多越发显得忙碌了，那时昆明市内交通不方便，私人住宅很少有电话，约人开会，找人签名，送个通知，他都不辞辛苦亲自跑腿。而且还要给民主报刊写稿，为报刊的编辑、发行而奔忙。新的工作任务几乎占据了他的大部以至全部时间，他为民主运动奔忙。与此同时，闻一多还得为生活忙，



他一家人的生活仍然依靠他的“手工业”来补贴，在经济实在窘迫的时候，便不顾疲乏、不顾健康地用他的“铁笔”赶工。同志们体谅他，青年们同情他，要求他爱惜自己。对此，闻一多总是无言地领受这友情的温暖，还依然坚持着工作。他常说：“内战在进行，人民在遭殃，假如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苟安地活着，不肯说话，怎么对得起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

反动派决心以人民为敌，内战的烽火越烧越烈。12月1日，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在昆明发生了。数百名反动军人和武装特务有计划、有组织地袭击了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校。他们肆无忌惮，殴打学生。结果，四位青年倒在血泊之中，50多人受伤。

闻立鹤这天也有一条腿被打伤，高孝贞劝他在家休息，他坚定的回答：“我是闻一多的儿子，闻一多的儿子是不能休息的！”

面对惨绝人寰的屠杀，闻一多愤怒到了极点，他说：这次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暴行，简直是血色恐怖。当年，“三·一八”惨案只是发生在执政府门前，而现在则是几百军人闯入学校，在最高学府内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的发生，也使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整个运动中，闻一多同青年一同呼号，一同痛哭，一样勇敢地和刽子手进行势不两立的斗争。为了更有力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闻一多还倡导罢教。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个非凡之举，在国民党统治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有力地配合了学生运动，并在“一二·一”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有声有色的光辉一页。在此期间，闻一多还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在“始末记”里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倦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的倒下去！”

烈士的血使闻一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更加深了，同时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实现民主的道路是曲折的，仍需进行更大的努力。

为解决“一二·一”惨案的有关问题，闻一多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在起草《告诉状》和《告同学书》以及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惨案真相的等具体事宜上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1946年1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了，会议期间，闻一多又为促进政协通过民主决议作了不懈的努力。政协会议闭幕后，闻一多又为捍卫政协会议成果而斗争，当校场口惨案发生后，闻一多一方面致函慰问郭沫若、李公朴，一方面又与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不在淫威之下屈服的革命精神。

3月17日，“一二·一”惨案的四烈士大出殡。这一天，昆明万人空巷，纷纷涌上街头为死难烈士送殡。闻一多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行进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队伍。在墓地的墓壁上，就刻着他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文中有对运动经过的记录，也有对四烈士的赞扬，有对反动统治者的揭露，也有对来人的召唤。他是这样写的：

“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

“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闻一多与送葬的代表一起安葬了四烈士。在墓前，他沉痛致哀，同时他也发誓永远为民主而战。

## 十、愿与各界紧紧握手

1946年5月4日，既是五四运动27周年纪念日，又是西南联合大学光荣结束的一天。

闻一多没能参加结业式，而是在同一时间出席了昆明学联举办的“青年运动研讨会”。

这是联大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大聚会，会议的主题是：从“五·四”到“一二·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上述三个问题，闻一多都有发言，而每一次发言，都带给人们更多的深思。

闻一多用回顾历史的方法从“五·四”运动说到“一二·九”运动，又从“一二·九”运动说到“一二·一”运动，他得出一个结论：“青年运动之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是青年运动必然的发展。”

闻一多以自己的体验寄语青年，希望他们认清历史规律，接受历史教训，大胆投向政治，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一位联大同学向闻一多辞行，闻一多所写的离别赠言是：“君子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这个“毅”是坚强、果决的意思，闻一多期望青年能为民主事业英勇战斗。在赠言的末尾，他盖下了印有“叛徒”两字的自刻章，闻一多选取“叛徒”的名字，代表了他要成为一个旧世界的叛徒的心愿。

闻一多对青年的厚望发自内心，语重心常。他还对留在昆明的青年也提出了希望，他深情地说：“不要忘记西南人民，勤劳地垦殖这块广沃的土地，把它变成更坚强的民主力量”。以便使将来的民主运动“也从昆明发轫，而那时充当这运动的先锋应该是“今天昆明的文艺青年”。

随着西南联大的结束，一支重要的民主力量也将回到华北去。反动派以为昆明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会消沉下去，但是，他们估计错了。于是恼羞成怒，他们所惯用的那些诬蔑、谩骂的下流手法也开始出演了。不少的人突然失踪了，进步出版社被查封了，许多私人住宅被搜查了，黑色恐怖又笼罩着昆明。当然，为民主而斗争的闻一多也早已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朋友们、学生们都为他愤愤不平，同时也为他的安全重新担起心来。闻一多却安慰大家说：“没有爱，也就不会有恨。被人民所爱的必然会被反人民的人所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那些恐吓就让他们恐吓吧，我们要是真的相信那些唬人的话，把已经负起的责任丢了，就恰好是上了它们的当。”

闻一多在这恐怖的气氛中，无所畏惧，继续做着民主工作。为了表明民主运动的目的意义，促进各方面的联系，6月27日至29日民主同盟云南支部连续举行了三个招待会。

第一次招待会在商务酒店举行，闻一多做了发言，他说道：“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来与各位合作。我们的手，虽无缚鸡之力，不可能也不愿意来威胁利诱别人，但也决不接受别人的威胁利诱。我们并愿意以这支满是粉笔灰、毫无血腥气的手去扭转中国的历史，去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他还一再强调民盟的要求，即8个大字“和平建国民主团结”。闻一多的话，给与

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三次招待会都如期召开了。闻一多声音沉静，娓娓而谈，既讲到自己的转变过程，又叙说了对于民主运动的想法。他号召大家：我们再不是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的中立者了，今天我们要站出来，要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我们认为民主、和平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民主运动是属于大家的，不是仅仅属于一部分人的，只有把全国爱和平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中国的进步才有希望。闻一多的讲话，没有讲稿，没有提纲，但每一句话都打进听众的心坎。一位商界贤达很有感慨地说：“看到一些壁报时，还以为民盟领袖是些青面獠牙的怪物，今天见面才知道都是文质彬彬的手无寸铁的书生。……我是商人，我愿意第一个伸出我这污秽的手同他们握，……我希望我们士农工商各界都伸出自己的手来深深地同他们握着。

通过三天的招待会活动，向民主运动伸出手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民盟的主张，赢得了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与此同时，闻一多还主持了另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即发动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经过宣传、组织，从25日拟稿排印到27日下午，在文电上签名的已达5000余人。

闻一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从事着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不仅如此，他还渴望把民主运动带回北平，以实现和平建国民主团结。

## 十一、气壮山河的讲演

学校把闻一多动身的日子排在很后。他的妻子患有甲状腺炎，引起严重的心脏病，为免去路上的颠簸，闻一多决定乘飞机返回北平。6月20日，他让立雕、立鹏两个孩子先飞重庆，在那里等全家到齐同返北平。两个孩子要走了，出门前闻一多还叮嘱路上小心，注意身体，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别。一直等到7月11日，飞机都没有轮到他。这一天，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昆明。

进入7月以后，形势更加恶劣，反动报刊登载了，大街小巷也贴满了咒骂民主人士的反动标语，并公开叫嚣要暗杀那些“鼓动青年”的人。甚至有的扬言，要用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就在闻家的门口，也时常有人盯梢。

就在7月11日晚上，民主战士、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便遭到特务暗杀。青云街学院坡，淌着李公朴的热血。

深夜一点钟，两个青年匆匆地敲响西仓坡宿舍大门，报告了李公朴遇刺的消息。正在生病的闻一多不顾高烧，拿了手杖就要出去。高孝贞和报信人拉住了他，要他等天亮了再去，以免发生意外。好容易算是拉住了他，但闻一多睡不着，恐怖笼罩着这座城市，昆明在黑暗中颤动。

12日清晨五时左右，闻一多赶到云大医院。但是晚了，李公朴四点闭上了双眼。闻一多站在李公朴的尸体旁，泪水不住地往下淌，他不相信战友会死，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闻一多立刻转身赶回“民主周刊”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外发电公布事件、拟定抗议书，筹组治丧委员会。

这时候，街上的消息又传来了，暗杀黑名单上的第二号就是闻一多。朋友们纷纷劝闻一多少外出。闻一多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说：“李先生为民主

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

几天来，恐怖已经时常降临在西仓坡联大宿舍。门前总有人鬼鬼祟祟，整个宿舍风声鹤唳。高孝贞忍不住恳求闻一多：“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可怎么办好啊！”闻一多面对病妻、爱子和亲密的朋友，手里拿着几天来接连收到的匿名恐吓信，他知道事情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候了。但是，此刻在个人安危之外，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他说：“事已至此，我今天不出去，什么事情都不能进行。怎样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以后叫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叫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闻一多就是这样，一旦认准了方向，就会奋不顾身地一往无前。7月15日早晨，闻一多昂首跨出家门。

西仓坡是条狭窄僻静的小巷，特务要下手是最合适的地方。为了防止意外，杨希孟护送闻一多到云大至公堂参加上午的会议。

会上，李公朴夫人声泪俱下地报告李公朴被刺的经过，话语常被悲恸中断。混进会场的特务乘机起哄，怪叫。反动派的猖狂激怒了闻一多，他再也按捺不住，走上前去扶李夫人坐下，随后就拍案而起，即席做了著名的一次讲演：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只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鼓掌）

会场的情绪已经从悲痛转向愤怒，人们擦去了流出的眼泪，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只有一些特务还嬉皮笑脸，故意做出怪样子。闻一多大吼道：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起来，是好汉的站起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地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年轻的一代，献出了他们的血，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地鼓掌）

特务被这声音震慑了，正义者被这声音鼓舞了。会场的气氛更加激昂，闻一多继续说道：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摇头，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样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

多少年来积郁在闻一多心中的怒火，此刻像火山一样的爆炸了。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了

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人民！

……

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鼓掌）历史上没有任何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热烈的鼓掌）

闻一多真是天才的演说家和鼓动家，此刻他没有讲稿，但他相信昆明的青年是可以信赖的。他看看窗外的蓝天，闪耀的阳光，就像获得灵感一样满怀激情地继续说道：

“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看，光明在我们眼前，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

最后，闻一多又把话题转回来，坚定地說道：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轻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地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就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名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干下去的。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鼓掌）”

这是闻一多的最后一次即席演说。面对反动派的猖狂反扑，他横眉怒对，表现了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他是青年人热爱的导师、他是勇敢的民主斗士。他的演说，深沉、有力，使无数人斗志昂扬。他的演说，是射向敌人的投枪，是激励人民的战鼓。

## 十二、血沃中华

7月15日中午，闻一多离开最后演讲的至公堂，回到家中。妻子高孝贞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闻一多轻声对立鹤耳语，“我去云大演讲了！”立鹤一怔，马上问：“怎么不告诉我？”时局不安，他一直跟着父亲起些保护和照应的作用。立鹤又问“会上情形怎样？”“很好，特务被我痛骂一顿。”闻一多得意洋洋。

“下午要招待记者，我稍睡一下，到一点半叫我。”闻一多太累了，说完便躺上床。

不到一点半，闻一多醒了，做好了外出的准备。他的妻子睁眼望着他：“怎么，又要去开会！”闻一多咳着，亲切地拍着妻子、轻松地说：“一会儿就回来，就只有这最后一个会了。”

闻一多与楚图南一起出门，立鹤不放心，一直护送到“民主周刊”社门口。分手时，闻一多让他四、五点来接一下。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立鹤待不住，就向府甬道走去。招待会没散，他便在外面踱来踱去。街上的特务很多，立鹤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

五点左右，招待会散了，为了不让特务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分头离开“民主周刊”社。闻一多出来了，他同立鹤慢慢向西仓坡走去。

从周刊社到西仓坡宿舍不过 200 米左右，拐个弯向西不远就可到家。闻一多松了口气，再有二、三分钟便可回到家中。

父子二人不慌不忙地走着，西仓坡行人不多，此刻则如死一样寂静，看看宿舍院子的大门，已经很近了，只有十多步了。突然，枪声从阴暗处响起，埋伏已久的几个特务一起扣动了扳机，子弹如雨点一样朝着闻一多射来。

闻一多头中三枪，胸部等也连被击中，当即倒下去。鲜血已从身上喷泉般涌出。立鹤一听枪响，便知道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毫不犹豫地扑在父亲的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射向父亲的罪恶子弹。特务们丧心病狂，连射数弹，立鹤拚尽全力大喊：“凶手杀人了，救命！”此刻他也身中五枪。特务还怕闻一多没死，又补上五六枪，然后在西仓坡口乘吉普车从容而去。

枪声响起时，高孝贞顿然惊起，她拚命向大门口冲去。大门外，父子俩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之中。她抢上去抱住闻一多，血，染红了她的衣服，连白色的脑浆都流了出来。再看看立鹤，也是身受重伤。

很快，闻一多父子被送到医院，立鹤的伤势很重，医生进行了抢救，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闻一多的伤是致命的，他的血已经流尽了。这位诗人、学者、为了民主运动，为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就这样走了。

## 尾声

闻一多带着对中国民主事业未能完成的无限遗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噩耗传至全国，人们震惊了，一切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人无不震怒。人们斥责反动派，抗议怒涛席卷而起，人们声援民主战士的电，纷至沓来。

中国共产党人对闻一多惨案极为愤怒，毛泽东、朱德 17 日给高孝贞发来唁电：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同天，在南京参加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也联名电唁闻一多。电文云：

惊闻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立鹤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捶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无忌，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

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

闻一多的同事与战友更是悲愤莫名。他们以各种形式寄托对这位友人、师长的哀思，并赞颂他是“民主之魂”；他为真理为民主而牺牲，其精神将永生；他用自己的生命，吹响了埋葬旧世界冲锋号的一个音符。闻一多，虽死犹生。

